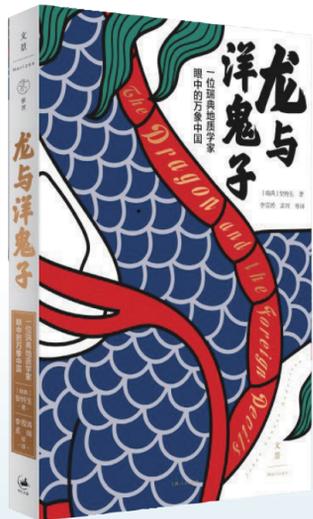


那些三瓶罐罐里， 承载着万象中国

□陈履生



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生与瑞典学者安特生关系密切，他发现了仰韶文化，并在中国树立起“科学考古”的概念。他的《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书写了关于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呈现了考古拓荒时期的中国气象

瑞典学者安特生所著的《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与作者身份的复杂性一样，是一本很难定义的非典型书——它既不是讨论地质学的理论原典，也不是专论考古学的研究著作，更不是记录人们所熟悉的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或开拓者的学者安特生的种种个人经历。

安特生在这本书里没有讲与中国考古学相关的“仰韶文化”“北京猿人”的发现等，而是讲其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万象中，作者的视角和眼光，既关系到考古学的社会基础，又关系到考古社会学的方方面面。显然，没有这种对于社会的独特视角和眼光，怎能够发现史前时代的人以及新石器时代中的那些陶器——这岂止是那些历史久远的瓶瓶罐罐？这显然是能够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的文化类型。

这本书写的是关于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它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这本书从第一章的“中华帝国”到第二十二章的“国民革命”，都反映了安特生眼中历史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状况，它们与考古学的社会基础以及具体的考古发现之间有着难以剥离的关系。和一般的书不同的是，这本书的译者李雪涛教授写了一篇长达58页的“导读”，长度几乎是全书的六分之一。“导读”共有13个部分，为人们读这本书提供了很多背景资料，也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学者研究这本书以及安特生的具体成果。更重要的是，“导读”对认知安特生的历史贡献以及与中国考古和地质学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帮助，这一译本也因此而显得异常精彩。

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生与安特生有着紧密的关系。是他发现了仰韶文化，是他把中国文人数以千年来对于古物的兴趣引入到现代考古学的路径之中，并在考古学的学科领域开拓了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中国树立起了“科学考古”的概念。所以，安特生在他的“前言”中说：“当瑞典出版商要我讲述在中国服务11年的印象和想法时，我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表达我对伟大而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确实，中国成就了安特生，而安特生对于中国的贡献也在于他的专业基础和他的天分，以及他与中国考古的独特的情缘。今天人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东亚博物馆中，可以了解到安特生对于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因为这里展示的都是安特生捐赠给瑞典政府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历史文物，而它们都与安特生的发现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这里还展出了与安特生相关联的诸多文献，他的发现、发掘以及整理都是这座博物馆中的重要展示。在这里可以看到1916年北洋政府发给作为农商部顾问的他以“三等嘉禾勋章”“以资优异”的证书，而那些丰富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陶器等，则是他在中国考古发现的具体成果。可以说，它们是世界各博物馆中发现时间最早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集中展示。看到这里的陈列，再读这本书，就都能够想象到这位“洋鬼子”在他那个时代的千辛万苦。

毫无疑问，这本书包括安特生本人给予我们的特别的启示，这就是考古学的专业基础。相对而言，安特生并不具有现在院校中所学的考古学的专业基础，他的地质学专业实际上和考古学之间也相距甚远。安特生以独特的天分和运气在中国发现了与中国历史关联的仰韶文化等重要的文化类型，使得中国历史在现代科学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链条。所以，这本书所呈现的这些丰富的内容，能够让人们大致了解到安特生时代中诸多的独特性和可能性。

这本书既有真实的记录，也有回忆，还有像小说似的虚构。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构成，阅读这本书实际上正像阅读这一时期的历史一样，能够看到很多具体的内容。尤其是导读中特别谈到的德文版中的珍贵照片，正是本书的一个亮点。虽然在这本书里面没有看到他所发现的仰韶文化彩陶等重大考古发现成果，也没有介绍瑞典的东亚博物馆，可这些珍贵的照片也能成为读者阅读、欣赏、了解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重要媒介。书中的插图正像考古成果那样，关联了一个时代与考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方方面面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发展和沉淀，今天已经成为博物馆中展陈的重要资料，也是公众所感兴趣的历史。

中国现代考古学作为时代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不能置身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之外，新知识、新学问和新认知应运而生，是时代使然的“龙与洋鬼子”的风云际会。今天，中国考古学历经百年的发展，从业众多，硕果累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安特生的时代，那从无到有的开始，正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发端。

以纸上的门户见证历史

□刘纳新

一本杂志就像一束带着朝露的鲜花，编辑像是辛勤的园丁，在晨光熹微中将它从文化和思想的百花园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月刊《奇妙博物馆》就是这样一束鲜花，仿佛带着初夏的气息，从安大略的瀑布，来到海洲的连云港。

什么是博物馆？开篇即有来自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解读。看完这篇文章，我像任性的孩子一样，跳到最后“跟着狐狸老师去看展”，然后再回过头来，翻阅主编和文编密切配合而展现出的多彩、丰富的文史话题。2003—2007年期间，我曾有幸在天津科学与生活杂志社担任编辑部主任，其间与德国PM杂志有过一段时间的版权合作。PM杂志有一本历史分册，里面都是德国考古学界的精美文章，让我当时很惊奇也很不解，为何一本大众科学读物需要如此卖力地介绍历史和博物馆里珍藏的东西？

多年之后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人类文明尤其

是文化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它以物理的、文献的、证据的事实为基础。如此，历史才具有主流的叙事与解读。人类学、考古学正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标定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与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远不止是历史小说。《红楼梦》的价值在于通过虚构的情节，让读者看到人性和在社会历史中人的命运的真实。但是博物馆则不一样，大英图书馆中保存的莎士比亚的手稿不在于里面的文字故事，而在于这是莎士比亚汗

水和气息曾浸染的纸张，因为手稿，无论再版和编辑多少次，经过多少不同的出版商的手，只有一个真实的莎士比亚。有时候，我们去博物馆拜访的不过是一个残片，或者是需要学者才能解读的铭文。但那几片竹简、一个青铜器上的铭文或者半截墓碑，正是我们面对的时间的刹那与凝固的片段。

在虚拟现实变得十分强大的时代，我们面对这种虽然不能直接触摸，但知道它的唯一和存在

考古是与古人的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出土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也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精魂。今年6月份，我们曾经推出过一期关于夏文化与蜀文化考古书籍的评论文章，本期延续这个话题，特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术委员会主任陈履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高伟、《小读者》主编刘纳新，谈谈面向大众读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考古读物。

——编者

“考古学不是看见，而是发现”

——评罗伯特·凯利的《第五次开始》

□高伟

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Robert L. Kelly)原著、上海大学徐坚教授翻译的《第五次开始》行文风格简洁轻快，读来流畅而有互动感，是“与一名乐观的考古学大家的对话”。书中将恢宏的600万年人类历史的变革凝结成4次“开始(beginnings)”的提法极具感染力与创新性，可以称得上是近年来最理想的面向公众的考古科普著作之一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古代人类遗留的物质材料的学问。用老百姓的话讲，考古工作者是一群挖土的、研究过去的人。老一辈考古人也喜欢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自己职业的自画像。考古工作者似乎和“过去”绑定了。当然，这并无不妥，职业性质决定一些对于过去社会的认识，只能来自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中华文明本源，阐释中华文明的特性，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出一份力，是当代考古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是否也需要望向未来？考古学能否为我们不断发展的文化做出贡献？面向未来，青年考古工作者能做什么？我是带着这些问题阅读《第五次开始》这本书的。

《第五次开始》这本书由上海大学徐坚教授翻译，作者是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Robert L. Kelly)，怀俄明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任美国考古学会会长。得益于原著简洁轻快的行文风格，使得该书阅读起来流畅而有互动感；每到章节中的微言大义之处，又会引人深思。比起本书的副标题“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笔者更愿意把阅读本书当作是“与一名乐观的考古学大家的对话”。

未来无法预测，只能创造

仅凭标题便可以看出作者是一名对未来有所思考的考古学家，就像全世界的考古工作者公认的那样，“研究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未来”。法国国家预防性考古研究院在成立时也向公众喊出了一则口号：“Nous fouillons, c'est votre histoire”，直意为“我们所发掘的正是你们的历史”。仔细品味，这其中既有对历史的强调，也包含着塑造下一代历史观念的意义在里面。笔者深知其中不易，故对凯利教授在前言中的直抒胸臆深表钦佩：“我无意于用史前史预测未来，预告什么将会发生，以便弯道超车。相反，我想理解过去，这样就能帮助创造未来……这本书就是我为让未来世界变得更美好所尽的绵薄之力。”

将恢宏的600万年人类历史的变革凝结成4次“开始(beginnings)”的说法极具感染力与创新性。第一次是技术的开始，人类在300万年前后开始首次使用石器工具；第二次是文化的开始，大约发生在20万年至7万年前，包括人类开始抽象地构建世界、语言与艺术的生产、宗教的产生等等；第三次是农业的开始，自一万两千年前后在世界各地相继发生，人类开始由“狩猎—采集者”转变为定居者，驯化动植物，最终变为农民；第四次是国家的开始，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体现在宏伟的纪念性建筑上，特别是近五千年以来，科技与生产力飞速发展，帝国在战争与冲突中此消彼长。仿佛每次都是一种跨越式的、全新的开始，铿锵四步已至眼前，下一步朝何处去？这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设定。作者假设10万年后有一名考古学家(相信那时仍有这个职业)，他或许会以人口增殖、全球化合作、物质的普遍相似等特征定义第五次开始。作者认为我们当下正处在这—临界点上。

其实，这4次变革都是考古学家熟悉的内容，只不过在不同领域的专家笔下表述各有不同，但以“开始”的说法将这些专业观点汇聚在一起，得益于凯利教授

的国际学术视野。他虽然深耕北美史前考古，但也曾在马达加斯加长期工作，多次访问中国、阿根廷和欧洲各国。我想正是如此学术经历才使得他能将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并进行宏观分析。可不得不指出的是，凯利教授在世界主要古老文明区域的田野考古经历并不丰富。这点其实可以从本书的古埃及事例中看出，类似图坦卡蒙的箴言、罗塞塔石碑、吉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托特神多次被提及，但在文中更多地起到修辞作用，对话题的讨论并无太多实质性帮助。虽然不能对作者有太多苛求，但若是对世界主要古老文明如古代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和玛雅等有更深入的认识与见解，我们读到的“第四次开始”这一章将会如之前几章一样精彩。

近年来，我国赴外考古已形成热潮并有序开展起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代表的国内多家考古研究机构与国外同行合作，在当地开展了长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201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区域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开展了发掘工作；2015年，又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工作；2018年，历史上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成立，中埃两个古老文明实现“握手”，共同对卡尔纳克孟图神庙区开展发掘与研究项目；2019年，对罗马尼亚雅西市境内的多布若瓦茨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工作者如此积极地、大规模地走向国门，走进其他世界古老文明的核心地带，践行文明交流与互鉴，应对未来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中国、中国的世界”产生正面影响。同时，我们寄希望于一批拥有国际学术视野的中国考古学家，为跨区域、跨文明的学术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看到公众考古的另一种可能

近几年考古和大众不断亲密接触，似乎已成为时代话题了。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讲，大众对考古的认识与需求将很快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作为一名青年考古工作者，自觉应当积极参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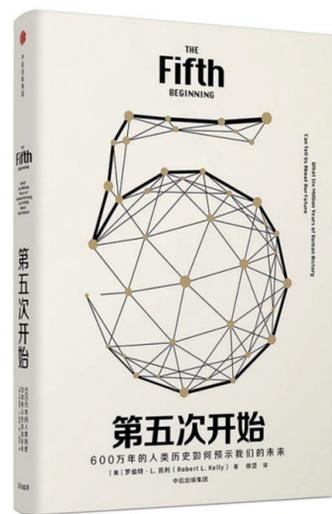
当前公众考古的主流思路是通过复原细节、罗列数据、打磨故事等方式，为观者营造身临其境之感，产生古今对话的共鸣。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普及，“穿越古今”之感的最佳获取方式也许已经不是一本精美的画册或一场高水平的讲座，而是在视觉特效技术加持之下的电影和电子游戏。游戏的体验感与历史真实可以通过学者与游戏公司的合作实现兼顾，实际上目前已有一些表现不俗的作品。

多年前，我曾与一名插画师合作，尝试制作一本展现古埃及文明全景的故事图册。而后当我被游戏《刺客信条·起源》所呈现出的古代埃及场景深深地震撼时，这本图册因故未能出版的遗憾也烟消云散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考古学家都应和游戏公司合作或成为电影编剧，而是疑问在“视听之娱”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种科普考古工作的思路。长期以来，公众看到的都是考古学家孜孜不倦地拼凑“浩瀚古代文明



的历史证据的时候，才能更为具象地理解何为文化性、历史性的真实。

文化性的真实可透过小说中的人物遭遇而呈现，对着虚构的历史人物，我们的心也能共情动容。然而博物馆里陈列着另外一种历史性的真实，它可能极为离奇、繁复、曲折，甚至看起来难以置信，但那些古画、残简、古剑，无不以“碳-14”同位素揭示的年代、微量元素的丰度谱线，向我们提供缄默却一致的证词：它们曾经存在过，且一直



拼图”的一面，而其他精彩的面相也应该被看到。

本书对于考古学和考古学家的描述很具有启发性。作者对于为公众写一本考古小书并且放弃细节这点信心满满：“他们(同行)也许会不满我弃置所有细节和其他视角于不顾。我预先向他们致歉，但是我只能讲我试图理解的故事。我关注宏观格局，因为我认为这才是考古学最大的贡献。”关于细节与真实的关系，凯利教授给出了属于史前考古学家的独到见解：时间和空间是考古学的双轮，考古学家常以数千、数万甚至十万年的尺度讨论时间：“在如此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考古学家)勾勒了宏大的图景，却缺乏细节。我这样告诉学生们，考古学家不一定始终能看见树木，但可以极其清晰地捕捉到森林。”

考古学是宏观的，它能够提供一种“缺乏细节”的真实。这种视角另辟蹊径，是大众媒体提及考古时罕见的角度。在作者的笔下，开启“上帝视角”后的考古学家形象不仅喜闻乐见，似乎还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见识与思考。译者徐坚教授在其《未来考古学》一文中也引用了作者的观点，“考古学不是看见，而是发现”。更进一步说，我们在为公众介绍考古工作时，不应只强调出土文物背后的历史细节，而忽视了考古学在智识意义上的真正贡献。本书作者认为这个贡献是用宏观视角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标记与记录。实际上，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也一直在做这项本质的工作。近年来，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实施，考古工作者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最后，这无疑也是近年来最理想的考古科普著作之一。前四次“开始”的浪漫化的说法虽不能被当作学术观点，但其包裹着的却是真材实料的考古学知识。如同一位老者面对前来问道年轻人娓娓道来，真理全部蕴含在故事之中。至于“第五次开始”，则属于作者个人的一次思想大冒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感兴趣的是一些说法已摆脱考古依据，变得颇具哲理：“树端的灵长类动物并无意于成为使用工具狩猎的直立人；他们也没想过能成为运用语言、使用符号的人类；狩猎采集者没有意愿成为农民，农民也不打算成为帝国的一员。通观历史，我们只是竭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

我们不妨继续带着思绪畅想下去，竭尽全力，去做最好的考古工作者吧！

存在直到如今。经过仔细的查考和阅读，我们就可以发现文明的历程是何等曲折不凡而辉煌，这些永恒的东西始终在历史长河的幽暗中闪烁着光芒。

在课程、考试，甚至屏幕时代的文化挑战面前，让孩子们有机会进入博物馆和考古历史的奇妙世界，培养他们区分以个人为中心的主观世界，以及文化性的真实与历史性的真实的分别，形塑他们的认知能力，显得尤其重要。《奇妙博物馆》月刊以孩子们熟悉的视觉元素和文化内容，将古今中外沉淀在博物馆藏品和考古器物中的人类历史介绍给少年儿童，虽然是纸上的门户，却恰好可以弥补信息世界带给孩子们的不真实感。

作为面向少年儿童的视觉期刊，《奇妙博物馆》为孩子们打开一扇审视人类自身的窗子，它拥有博物馆学者的关怀和指导，以“文化遗产”为中心，展现考古、历史、地理、建筑、科技、生物、环保、技艺等多元内容，以中华文明的系统诠释来深化孩子们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让他们能从历史里正视当下，也能基于历史把握未来。